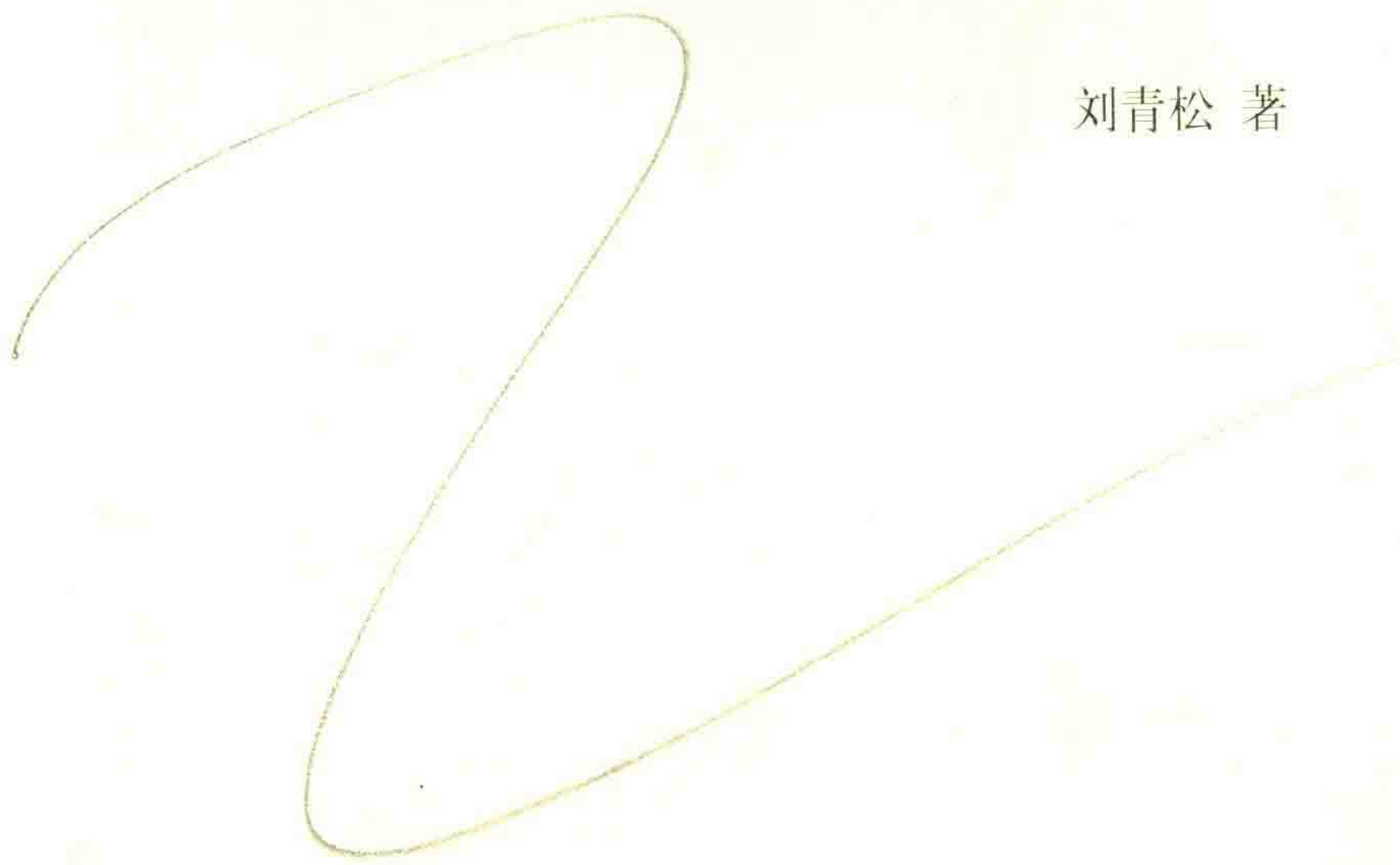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

The Research on Confucian Phonetic Gloss in *Baihutong*

刘青松 著



商務印書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

The Research on Confucian Phonetic Gloss in *Baihutong*

刘青松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刘青松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193-0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白虎通义》—研究
IV. ①B23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37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

刘青松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193-0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6¼

定价:7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王宁

古代训诂的“声训”，是一种很特别的训释方式，这种训释的特点是训释词与被训词有古音相同或相近的关系。前代学者以为这种训释反映了“音近义通”的语言事实，往往用以作为研究音韵和训诂的有效材料。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界接受了西方“音义关系任意性”的理念，而且把这种理念绝对化，因此把“音近义通”和“声训”都当成“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在那时，“唯心主义”不是一顶小帽子，传统训诂学的“声训”就这样被完全否定。在批判“声训”的潮流中，有两部书首当其冲，一部是《释名》，一部是《白虎通》。

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遗产问题有过很多反思，经过梳理，对在历史上曾被屡屡关注的汉语词源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有了初步的认识。梳理汉语词源学的发展历史、继承前人对汉字、汉语音近义通现象的描写与解释，必须从声训开始。《毛诗诂训传》等先秦文献随文释义中勾稽出的声训材料，以及《尔雅》《说文解字》的声训，进入我们的视野。在这个工作中，《释名》《白虎通》是两部绕不开的专书。章黄在讲解《说文》训释体例的时候，把声训称作“推因”，当然是把声训和汉语词源联系在一起；但是《释名》和《白虎通》的声训有些的确不符合推源的原则，语音关系牵强一些还好说，尤其是训释词和被训释词的意义关系，拿汉语的词源意义来解释，很多是扞格难通的。既然那些声训存在汉语词源音近义通的反证，就要严肃对待，这是我们的原则。不能“鸵鸟思想”，藏身不顾尾，明明另一些语言事实不支持论断，却由着别人去说，丝毫不以为意。

《释名》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刘熙在《释名序》里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这就明确宣称他要探讨的是普通生活用品与自然人文现象的名实关系，他所说的“义类”，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词源意义”，用现代学术来定位，这部书大致是俗词源之作，这就有相当成分属于语言学的命题。民间的推测，即使微观

上有些牵强,也情有可原;何况很多命名来源的探求,诸如“粉,分也”“饼,并也”“桌,卓也”等等,就是咬定“音近义通”是“唯心主义”的人,也很难轻易否定。我们将《释名》定名为“民俗声训”,是因为俗词源不仅仅对语言研究有价值,即使不符合语言规律的那部分,对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也有参考和验证的价值。

《白虎通》就不同了,它是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组织的、由汉章帝亲自主持的一次全国性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的成果汇编,据说是由历史学家班固整理编辑成的。经书本来就是古代封建帝制环境下的思想教科书,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想利用儒家思想强化“大一统”的政纲;可是到了汉章帝时,经学的流派已经很乱,不但有今文经、古文经之分,同一部经还有南、北讲解的区别;经过春秋战国的思想纷争,诸子之间也互相吸收,哪里还有纯粹的儒家经说!统治者要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儒家经典,就要“思想治乱”,白虎观会议就是要制定官方经学标准答案的。为什么叫“通”,就是经今古文合流,思想道德统一口径。这么一部官方“正统”的书,当然会有很多封建糟粕,许多思想今天是要拿来批判的。这部书在经学盛行的汉代影响很大,因而在经学、史学研究上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要从思想内容来说,的确难以平反。语言虽是客观的,理解却是主观的,《白虎通》声训背离汉语词源规律的地方实在太多,已经不能看成是微观问题。

但是,《白虎通》的声训量很大,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白虎观会议是汉代统治术的一个部分,古文经的宗旨是以“小学”通经,还原历史;今文经则是发扬旧说,服务现政,今文经学的思想必然占上风。《白虎通》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虎通德论》,书名后挂着“德论”二字,内容也多半是与古代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相关的术语,声训只是为了申述当时的义理,显然不是为“名源”问题量身定做的。因此,我们将它定义为义理声训。义理声训不止一部《白虎通》,散见在其他书里还有不少,可以成为一类。有些人用它来作为词源声训的反证,从而批判汉语词源的“音近义通”原理,显然是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违背了逻辑的同一律。

情况弄清楚后,我们从《白虎通》得到两个收获:

第一,是如何理解声训的来源。古代声训很早就有,黄季刚先生认为《大戴礼记》记载:“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就是文献可征的早期训诂,这也就是声训。但声训的大量使用应与汉代经学有关。从汉语语言学史的角度,早期的声训既然并没有探讨词源的明确意识,那么,用汉语词汇的声音关系做成训释,是基于什么样的起因和动机呢?黄季刚先生不

止一次特别强调：要想获得更真实的史料，不止要注意正史，还要关注野史；不止要取材经书，还要阅读纬书。《四库全书提要》有一段话说：“（《白虎通》）书中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讖，乃东汉习尚使然。又有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则礼之逸篇。方汉时崇尚经学，咸兢兢守其师承，古义旧闻多存乎是，洵治经者所宜从事也。”读了这段话，反观古代的纬书，声训的来源就比较清楚了。西汉盛行的讖纬之学，是古代神秘主义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后的成果。纬与经都是解释儒家典籍的，但纬书的说法来自师承家法，比之经过权威整理的“国学”，当然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并非只是因为杜撰和刻意伪造，也有很多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自然现象和人间逢遇的不理解，有神秘主义在其中是必然的。经过文人的记录，受到当时学风的影响，变为迷信妄说也不奇怪。讖是出于不同目的造出来的虚幻预言，有图讖，也有语讖。造讖有各种目的，不论是自己相信再说给别人听，还是自己并不相信只想要别人相信，神秘色彩或是一种必然，或是一种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同源词之间声音相同或相近，毕竟是一种语言事实，孳乳造词又是汉以前主要的造词方式，不但口耳相传的今文经学不难有所发现，民间当然也会有所感觉。在音近义通没有科学解释之前，本身就带有神秘色彩，所以，声训就成为纬书和造讖的手段之一。义理声训的初衷虽在宣教道德，目的是要建构汉代伦理说教的思想体系，但采用声训并非完全没有事实基础，《白虎通》里的有些声训不自觉地符合了汉语词源，也就毫不奇怪了。

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被称为“人类童年期文化”的神话传说，世界各个古老国家早期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乏见。这些神话传说在流传中后来虽不免被曲解，但也同时可以被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用正确的观点解读。一种现象被发现，大多有一个从迷茫到清醒的过程，经过梳理和深入探究后，才会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性主义。汉语词源学发展历史十分曲折，对音义关系的感受虽然很早，但直到宋代，才开始关注“右文”现象，刚刚沾上一点词源的边儿，还依然不得要领。到清代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陈澧的“声肖乎意”说、刘师培的“意象”说，才对音与义关系的可论定性有了一些比较理性的思考，渐渐接近了问题的实质。章黄的“孳乳”说、“推因”说，才直接进入了音近义通原理的探讨。章黄把声训定名为“推因”，应当是专指《说文》用声训说明汉字本义的那个有限范围，跨出一步就会成为谬误。太炎先生的《文始》首次建构了汉语同源词的音义关系体系，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有了更为现代化的同源词描述，我们才能在前人基础上梳理汉语词源学的理念，分辨相关的术语，声训的原理日渐清晰，早期

那些不自觉的声训的来历所含的合理性,也就明确了。

第二,研究《白虎通》还有另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义理声训从反面让我们特别注意了同源词系连的意义关系,词源意义是造词的理据,来源于人对意象的感知,既不等于词汇意义,更不能附会道德义理。论定同源词不能只注意语音关系,更要注意造词意象的相通。《荀子》“同状异所”“异状同所”的理念,太炎在《文始》中用“同状”和“同所”为条例论证同源词意义关系的做法,是传统语言学的精髓,是应当好好学习的。

我简要叙述《白虎通》与汉语词源学的一些重要理念,是为了说明刘青松《〈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这部书的选题价值。他的这部书就是上述理念的阐释和延展;是在有人全面否定《白虎通》声训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度的研究。这部书明确了《白虎通》声训属于“义理声训”的性质,弄清《白虎通》一书的历史文化特质,分清它与词源声训本质上的区别。该说明的问题,都做了比较详尽和深入的说明。

青松研究《白虎通》的思路是严谨的、方法是科学的。面对那么多对传统词源学的质疑,面对20世纪50年代曾被语言学界批得体无完肤的这部书,他选择研究《白虎通》这个题目,接受论证“义理声训”的任务,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全神贯注、十分小心。他先确定了广义声训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从《白虎通》一书中勾稽出360多条声训材料,证明了这些声训的目的不是解释语言,而是阐明义理,即使少数与词源声训偶然相合,也是以讲解义理为直接目的的。同时,他又将经书和纬书的声训与《白虎通》声训加以对比,从《白虎通》的声训来源,揭示了古人关注词源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和语言本体原因。这样做,不但还原了《白虎通》典籍的原貌,确定了它的学术定位,而且,将《白虎通》排除在词源声训之外,也厘清了对词源声训的误解,指出一些人仅仅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衡量《白虎通》并以偏概全来否定汉语词源学的荒谬,维护了从声训起步的传统词源学的科学价值。他说明了,声训并不神秘,除了先秦的“正名”思想对声训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外,汉代学者口耳相传的问学特色和民间的语言禁忌与谐声比附引起的一种求源的习惯,就是词源声训产生的深层原因。这些探讨,对科学的汉语词源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与思路。

在年轻学者中,青松是属于有学术追求的一类。毕业后,他花了数年时间,对《白虎通》一书进行了悉心地校注,有不少新的发现。读了他的书稿,我发现,他读了更多的典籍,认识有所加深,并已经认真核对了引文,改正了多处6年前的失误,古音的标记也重新核实过了。青松是在匀速前行,在不断提高水平的基础上不离不弃地推进自己的研究。《白虎通》是研究汉代经

学很重要的材料,以小学通经史又以经史通语言文字是乾嘉学者和章黄先贤留下的研究风气。希望再过几年,青松的根柢更为过硬,学识和理论水平又有提高,研究课题也逐步加宽以后,在语言学和语言史的研究上,还会有新的创获。

2018年3月25日

北师大

目 录

上编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

绪论	3
第一节 《白虎通》及其声训方式	4
一、《白虎通》的经学属性	4
二、《白虎通》声训的表述方式	6
三、《白虎通》声训的性质	11
第二节 义理声训研究综述	12
一、义理声训研究史	13
二、本书的研究目的	22
第三节 《白虎通》版本的择定	26
一、《白虎通》的定名与流传	26
二、抱经堂本《白虎通》的优缺点	27
第一章 《白虎通》义理声训的特点	35
第一节 《白虎通》声训的分类及其主观性	35
一、《白虎通》声训的分类	35
二、《白虎通》声训的主观性	39
第二节 《白虎通》声训的义理属性	43
一、《白虎通》名物的义理属性	43
二、《白虎通》同源声训的义理属性	47
第三节 《白虎通》声训语音关系的杂糅性	50
一、《白虎通》声训语音关系杂糅性的表现	51
二、《白虎通》声训语音关系杂糅性的原因	55
本章小结	57
第二章 《白虎通》义理声训的历史背景	58
第一节 《白虎通》声训的社会背景	58

一、先秦两汉的语言崇拜	59
二、先秦两汉的“正名”思潮	62
第二节 《白虎通》声训的思想背景	69
一、先秦两汉类比框架的形成及发展	69
二、《白虎通》的类比框架及其特点	75
第三节 《白虎通》声训的学术背景	82
一、讖纬是《白虎通》声训的思想来源	83
二、训诂、章句是《白虎通》声训的基础	89
本章小结	98
第三章 《白虎通》义理声训与两汉故训的关系	99
第一节 先秦两汉义理声训概况	99
一、数量庞大,各家分歧	100
二、随文释义,主观性强	102
三、配合别字,内容零散	103
第二节 《白虎通》对故训的整合	106
一、《白虎通》对故训的继承	106
二、《白虎通》对声训的创新	110
第三节 《白虎通》对故训的整合标准	116
一、语音方面以义理为标准	116
二、语义方面以义理为标准	119
本章小结	121
第四章 《白虎通》义理声训的思想文化分析	122
第一节 《白虎通》声训对阴阳五行的配合	123
一、五行与自然	124
二、五行与人体	132
第二节 《白虎通》声训对伦理观念的反映	136
一、君臣	137
二、父子	142
三、夫妇	144
第三节 《白虎通》声训对上古历史的构建	148
一、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定名	148
二、三王出身的神圣化	158
第四节 《白虎通》声训对理想社会的构拟	163
一、爵位	164
二、典章制度	167

本章小结	183
第五章 《白虎通》义理声训的影响	185
第一节 《白虎通》声训的实践是词源学的发端	185
一、《白虎通》声训对《说文》的影响	186
二、《白虎通》声训对郑玄经注的影响	188
第二节 《白虎通》声训的观念对词源学具有积极影响	191
一、焦循以假借说《易》举例	191
二、焦循与汉代章句之学	195
三、焦循对因声求义的启发	197
本章小结	198

下编 《白虎通》义理声训疏证

凡例	201
卷一	202
卷二	227
卷三	258
卷四	276
阙文	292
附录 先秦两汉义理声训疏证	301
释天第一	301
释地第二	310
释山第三	312
释水第四	314
释州国第五	318
释爵秩第六	323
释礼乐第七	325
释政令第八	331
释形体第九	334
释长幼第十	335
释亲属第十一	337
释言语第十二	338
释草木第十三	342
释禽虫第十四	344
释饮食第十五	346

释衣服第十六	353
释宫室第十七	355
释床帐第十八	361
释书契第十九	363
释典艺第二十	366
释兵戈第二十一	375
释道路第二十二	379
释祭祀第二十三	380
释丧制第二十四	391
参考文献	395
后记	404

上 编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

绪 论

声训是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对它的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声训包括被训词与训释词之间所有音同、音近的训诂,而狭义的声训只包括被训词与训释词之间音近义通的训诂。前者侧重被训词与训释词外在的语音形式,后者侧重被训词与训释词音义之间的联系与理据。20世纪中后期,语言音义关系任意性的说法相当流行,认为音义关系任意性是唯物主义,理据性是唯心主义,一些学者将声训现象不加选择地批判为“唯心主义”,以《白虎通》为代表的汉代声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①从语言学角度看,这种批判是有道理的,因为广义的声训中有很大一部分材料是不符合语言规律的,但据此得出“声训是应该批判的”的结论则有些以偏概全,因为这个结论否定了语言中存在音近义通的客观规律。约定俗成是音义关系的总规律,音近义通则是词汇发展所造成的局部规律,二者各有其合理性。早期声训的语言学意义在于:实践上,系联了一部分同源词,尽管为数不多,但却是科学词源学的发端;理论上,认为音义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尽管有失绝对,但促使人们考虑音义之间的联系,具有积极意义。

据我们统计,《白虎通》一书有声训 363 条,涉及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这些声训大部分不符合音近义通的规律,而是以声音为手段阐述义理,即义理声训。先秦两汉声训皆在义理声训范围之内,狭义的声训因符合音近义通的规律而从广义的声训中脱颖而出,成为科学词源学的发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声训因此而成为一无是处的糟粕,它依然有其语言学及语言学以外的价值,值得我们去思考。

^① 这一时期,批判声训成为一种风气,王宁先生在《古代语言学遗产的继承与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中提到“50—70年代是语言学大批判的高峰”,其中的第一个批判就是声训。但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只有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就此笔者问过王宁先生其中的原因,先生说,在当时的特殊时代,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并未正式发表。

第一节 《白虎通》及其声训方式

东汉建初元年(76),兰台校书郎杨终鉴于当时章句学者离析经义,导致各家严重分歧的现象,上疏章帝仿效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故事,以协调日益激烈的学术纷争。建初四年(79)冬,章帝召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①,最终命班固撰辑而成《白虎通义》(后世简称“白虎通”)一书。“通”以通经为旨,“义”取释义为名,因此,可以说《白虎通》是一部“钦定的经学概论”^②。《白虎通》的行文方式是以设问提出问题,回答者从五经中寻找证据应对,兼存异说。全书条理清晰,义旨简要,时人评为“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③,强调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后人云:“群经家法具在,抉择亦精,诚六艺之总龟也。”^④则侧重其学术史的价值。

《白虎通》是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它的特点是以声训的方式申说义理,不但吸收了先秦两汉经、纬著作中的大量声训,还依据当时的需要进行了创新,成为上古义理声训的集大成者。

一、《白虎通》的经学属性

汉代经学分为两途,一为古文,一为今文。关于《白虎通》的经学倾向,大多以为倾向今文经学,如皮锡瑞以为《白虎通》“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⑤。金春峰则倾向古文经学,他认为白虎观会议的参与者班固、贾逵是古文学者,有“殿中无双丁孝公”之誉的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又授杨伦《古文尚书》,亦兼通今古文,特别是章帝爱好古文,因此“《白虎通》中古文经学者的观点更有相当大的影响”^⑥。这两种说法中,前者占据上风。实际上,经今、古文之争是政治利益之争,经义只是他们斗争的工具。二者互相影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对方有利于己的成分,

① 《后汉书·章帝纪》。

②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322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③ 《后汉书·蔡邕传》。

④ 谭献《复堂日记》卷一,《丛书集成续编》217册,692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

⑤ 皮锡瑞撰、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77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4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